

中国新移民及其主要输出地

[日] 山岸猛

前言

从人口逐渐有可能往国外移动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人口普查可以看出中国新移民的趋势。本文拟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在往国外的人口移动最多的省、地区中,选出可以按时间顺序捕捉其动向的地区,考察将人口输往海外的地区的特征。

“新移民”主要指改革开放后因私出国定居的中国公民。因此海外旅行不算在内。但是,实际上因私出国定居和海外旅行有时难以进行严格的区分。短期的探亲和与海外亲属的团聚也难以区分。在留学生当中,也有毕业后就业、取得居留权的人,因此是在海外居住还是留学后回国也很难区分。实际情况也很复杂。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往海外的国际人口(劳动力)移动。因此将比较灵活地运用“新移民”的意思。另外还想触及一下具有出国预备军性质的出境者。

一、福建省的新移民

根据福建省侨办的1997年侨情普查,1949—1996年福建省整体的移民为53.35万人,其中90%以上是1979年以后出国的新移民。1979—1996年的新移民为50万人左右。

刚改革开放的1979年的出国人数为4800人,1984年福建省公安厅公布了“公发(境)59号文件”后,出国人数骤增至35300人,在1986年福建省公安厅公布了“公发(境)61号文件”后,出国人数减至6700人。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后,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不稳定,与全国一样,福建省也可看到出国者的增加倾向。1995年达到了51700人,同年国外定居人数达到了13100人。1996年福建省公安厅发布“公境出744号文件”后,出国人数达到了迄今最高的62600人。1998年稍有减少,但同年也有57700人因私出国。

就1979—1998年福建省因私出国的目的来看,探亲最多,占了31.3%,旅游为16.1%,国外定居为10.1%,自费留学占9.8%,海外劳务为6.4%,等等。不过,这是近20

年的平均值，各年度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就海外留学来看，1988年在福建省的因私出国者当中，自费留学者占了78.8%，而1997年和1998年在因私出国者中仅占2—3%。

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福建省的国外暂住人口为13万人以上，仅次于云南省。而且其他省份的因私出国者都在6万人以下，福建省的因私出国者人数便更为显著。该省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在出国者中自费留学生很少。就福建省的因私出国（新移民）目的地来看，美国、菲律宾、日本、新加坡最多，这4个国家占了66%。福建省整体的新移民有60%前往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40%前往东南亚。这与以前的华侨出国时代不同。就1979年以来的新移民输出地来看，集中于福州和泉州。福州占49.6%，泉州占34.6%，仅这两个市便占了84%。

下面来看看各地区的情况。

（一）晋江地区的新移民（出国、出境者）

晋江市1994年被列为全国百强县（市）的第十五位，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199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5257元。

20世纪50年代以来，晋江地区归国华侨及国内侨眷为了探亲和继承家业而出国。根据晋江公安局的统计，1953—1965年的出国人数为9636人，文革结束后的1976—1986年的出境人数增至16965人。

表1 1953 - 1986年晋江人出境、出国情况表

（单位：人）

年份	1953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人数	552	682	1071	962	581	381
年份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75年
人数	1467	1506	739	615	661	缺文革期间统计
年份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人数	136	156	7055	185	1471	207
年份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合计
人数	55	156	2350	2458	1836	26601

注：合计26601人是居住者13985人和没有写明居住的12616人的总人数（吴泰主编：《晋江华侨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4页）。

资料来源：根据晋江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统计数字编制。

表1中的1953年至文革开始前的60年代中期的出国者大部分是前往亚洲，改革开放后才出现了前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西班牙等西方各国的出国者。

在1953—1986年的26601名出国、出境者当中，一部分人获得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等居住国的许可定居下来。但一部分人并未取得移民签证，便居留于香港、澳门，或成为两地的居民。根据吴泰主编的《晋江华侨志》附录中登载的“1953—1986年出入境部门批准的前往香港、澳门的晋江人数一览表”，1955—1959年出入境部门所批准的前往

香港、澳门的出境者为 16 834 人，大多数前往香港。除了文革期间的 10 年，1953—1986 年前往香港、澳门的出境人数为 60 234 人，是表 1 数值的 2.2 倍，而且这个数字是前往香港、澳门的出境者，并未包括出国者。晋江前往香港、澳门的出境者历来很多。

从表 2 可以看出新中国时代晋江前往香港、澳门的出境者之多。

表 2 晋江人出境、出国目的地（1953 - 1995 年）

年份	香港、澳门	东南亚、欧洲、美国	合计
1953—1977 ^①	36 840	9 928	46 768
1978—1986 ^②	23 394	16 673	40 067
1991—1995	30 991	4 532	35 523
合计	91 225	31 133	122 358

注：①缺 1954 年、1966~1975 年的统计数字；②缺 1987~1990 年的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根据晋江出入境管理部门（公安局、侨务办公室）统计数字编制。

根据 1987 年的晋江侨情调查，晋江市的海外华侨华人为 94.45 万人，其大多数集中于东南亚。菲律宾最多，有 65 万名晋江人居住，占了 68.8%。第二位是印尼，有 9.5 万人，第三位是马来西亚，为 7.5 万人，第四位是新加坡，为 4.5 万人。此外，还有在香港、澳门的晋江人。根据 1987 年的侨务部门的统计，有 29.85 万名晋江人居住在香港、澳门（其中澳门 2 万余人）。而且，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90 年代，许多新移民移往香港。

表 3 晋江市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申请出境、出国者人数（1993 - 1998 年）

（单位：人）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 申请因私出国 受理者 （定居、探亲、自费留学、劳务等）	584	801	1 799	5 310	3 940	3 961
2. 获准前往香港、澳门者						
a. 定居	2 996	1 244	1 696	2 023	1 468	1 378
b. 探亲	4 276		5 011	5 411	4 988	6 077
3. 获准前往台湾者			771	1 387	3 940	1 404
a. 定居	10	127				
b. 探亲	44	145				

资料来源：1993—1995 年的数字系根据《晋江年鉴（1996）》（方志出版社，1998 年，第 249 页）；1996 年的数字系根据《晋江年鉴（1997）》（方志出版社，1998 年，第 111 页）；1997 年的数字系根据《晋江年鉴（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06 页。）；1998 年的数字系根据《晋江年鉴（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20 页）。

传统上往许多华侨华人居住的菲律宾的出国在经济困难时期的 1960 年和 1961 年这 1 年期间便超过了 1 000 人。改革开放后, 1985 年为 2 258 人, 1986 年为 1 804 人, 在已知道的出国目的地中, 大多数前往菲律宾。同一时期, 就从晋江前往香港、澳门的处境来看, 1961 年为 1 809 人, 1962 年为 4 418 人, 可见在经济困难时期较多。改革开放后, 1985 年为 1 493 人, 1986 年为 1 499 人。另外, 新中国成立后, 从晋江前往香港、澳门的出境人数最多的年份是: 1957 年 4 288 人、1958 年 4 784 人、1959 年 3 813 人, 大跃进这一政治运动时期较多。此外, 改革开放前的 1976 年“四人帮”倒台时为 4 888 人, 改革开放后的 1980 年为 5 410 人, 1981 年为 3 852 人, 1983 年以后稳定为 1 500 人左右。

以上是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90 年代晋江市的因私出国情况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来看, 因私出国者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增加, 整体的因私出国的增减与上述的福建省整体因私出国人数的变动大体相同。但如果仅限于晋江市, 比起因私出国, 前往香港、澳门的因私出境者的增多是一个特征。

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向晋江市内的香港、澳门眷属散发“内地居民申请往港探亲须知”、“1998 年内地居民赴香港、澳门定居、探亲审批办法”等小册子, 为前往港澳地区居住、探亲提供了方便。在关于往香港的探亲申请的小册子中写有上级的指示, 即亲属居住在香港的晋江眷属每月允许 500 人从晋江市前往香港探亲。

过去, 菲律宾华侨华人较多的晋江人在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 从晋江市的外流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香港、澳门。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对前往香港、澳门定居、探亲特别提供方便也反映了这一点。往香港、澳门、台湾的人员外流成为主流的原因之一是该地区的资本往晋江市的流入。

表 4 晋江市外资来源国、地区 (至 1997 年底的累计)

(单位: 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项目数	合同外资额
香港	1 886	205 543
澳门	95	15 937
台湾	158	21 279
菲律宾	114	39 470
新加坡	27	3 232
印度尼西亚	3	466
马来西亚	9	1 115
泰国	2	257
日本	10	601
韩国	13	5 603
美国	6	749
加拿大	2	227
合计	2 330	294 814

资料来源: 晋江市外国经济贸易委员会。见赵文骧等论文《《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 第32、40、41页)。

从表 4 来看, 1997 年以前晋江市的合同外资累计额为 29.4814 亿美元。其中香港为 20 亿以上, 占整体的 69.7%, 加上澳门的 5.4%, 占了 75.1%。再加上台湾的 7.22%, 港澳台占了 82.3%。改革开放后持续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福建省晋江市的外资(合同额)的 82.3%、项目件数的 91.8% 是来自于港澳台的投资。特别是来自香港的投资额占绝大多数。1997 年, 在晋江市出口总额 2.5 亿美元中, 往香港、澳门的出口为 1.1538 亿美元, 占了 46%, 第二位是东南亚 5 国, 为 3762 万美元, 占了 15%, 第三位是欧洲, 为 3010 万美元, 占了 12%。由此可知往香港、澳门的出口额之多。

如上所述, 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在 90 年代以后, 晋江市人员、资金、物资外流的主要目的地是香港和澳门。

2002 年晋江市的出国形式除历来的主流——探亲之外, 包括海外旅游、商务、自费留学等, 已趋于多样化。晋江公安部门也放宽了出境、出国手续, 因此 2002 年 1—10 月晋江人申请的出国、出境者达到了 4 万人。进入了晋江人 100 人中有 4 人出国、出境的时代。

(二) 福建省福清市、三明市(明溪县)的新移民

1. 明溪县的新移民

以往并非著名侨乡的一些地区改革开放后成为新移民大量出国的新侨乡。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就是这样的地区。三明市是属于福建省内陆部的地区。根据 1988 年的统计, 三明市整体的华侨华人只不过该市总人口的 1.79%。该市整体的归侨(2869 人)和侨眷(21731 人)合计为 24620 人, 只占了该市总人口的 1.08%。过去是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淡薄的地区。在属于三明市的十县之一的明溪县, 同样根据 1988 年的统计, 在明溪县人口 10.2 万人中, 海外华侨华人只有 776 人, 明溪县的归侨 49 人和侨眷 613 人加起来为 662 人, 仅占该县人口的 0.65%, 是一个与华侨华人的关系比三明市整体平均更为淡薄的县。但是, 改革开放后, 前往东欧和亚洲、美洲等 23 个国家工作、劳务出口的人增加了。2002 年夏, 从该县出国的新移民达到了 5530 人, 这是该县人口的 4.7%。而且, 他们在海外工作所赚的钱 80% 以上都汇回了家乡。

根据《福建侨乡报》(2002 年 5 月 3 日), 90 年代明溪县鼓励出国打工挣钱。即, 该县政府设立了出境服务中心, 设置了海外劳务信息和法律咨询、海外航空价格咨询及来自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咨询、海外需求量多的中餐厨师、电工、计算机、英语、俄语、东欧国家情况等培训机构, 实施了为出国农民保留耕地等优惠措施。这样, 明溪县便有 3169 人出国打工。他们自 1995 年以来每年汇回 1000 万美元, 7 年期间共汇回人民币 6 亿元。

以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李明欢研究员为首对三明市明溪县的新侨乡进行了调查。根据该调查, 明溪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由 4 个镇、5 个乡组成, 人口 11.6 万人, 80% 是农业人口。1989 年, 明溪县沙溪乡沙溪村的一个名叫胡志明的村民首先出国。胡志明的家乡是浙江省温州的文成。浙江省温州文成以侨居欧洲的同乡人多而闻名。

胡志明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期移居明溪县沙溪村, 从事蘑菇栽培。1989 年, 受到

家乡温州文成的移民潮的影响，胡志明得到家乡亲友的帮助，取得前往乌干达的签证正式出国。许多出国的温州文成人实际上去了意大利，胡也在意大利非法滞留，在皮革厂打工，翌年在意大利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大赦下成为了“意大利华侨”。其后，胡志明仅在1990年一年内就帮助16名沙溪人出国，并利用意大利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大赦，使他们获得了意大利华侨身分，人们甚至说“胡志明是我们村的大英雄”。明溪县出国者骤增的动因主要是收入差距。“在意大利干一个月，超过在明溪县干一年，在意大利干一年，就能在家乡盖一幢楼”。这种信息转眼之间便传开了。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东欧巨变后出现的新机遇，又增加了“在俄罗斯、匈牙利也能赚钱”的传闻，出国热愈发高涨。

明溪出国打工的目的地主要是欧洲。根据2003年6月的统计，前往意大利的占36%，前往匈牙利的占34%，仅这两个国家就占了全体的70%。此外，前往俄罗斯的占14%，前往保加利亚的占3%。如上所述，明溪人出国集中于欧洲，亚洲最多的新加坡也仅占4%。7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对接纳移民趋于严厉，仅限于以下移民：①家庭团聚；②政治难民；③拥有特殊技术的人才及投资移民。明溪县的新移民并不具备上述条件。但在短短的十多年间，明溪新移民中获得移入国各类长期或短期合法身分者已达到55%以上。移入意大利的明溪县新移民抓住了该国对非法移民实行大赦的机遇。在意大利，1982、1986、1995年对总计55万人的外国非法移民实施了大赦，给予了承担纳税义务的合法居留身分。其中也有明溪县新移民。

匈牙利的情况与意大利不同，根据1988年中匈两国签订的“中匈互免签证协议”，直到1992年11月13日之前，中国人均可自由进入匈牙利，并可获得具有2—3年居留权的黄卡和具有15年居留权的绿卡。过去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海外关系淡薄的明溪县也由于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增加而成为了新侨乡。

除了明溪县以外，作为地方政府为出国打工赚钱设立培训所奖励出国打工的地区，还有属于福建省莆田市的莆田县。2002年在该县110万人口中，相当于1%的1万人出国打工。该县埭头镇石城村依靠海外的同村人，从1994年开始大量的村民便出国打工挣钱。首先在县内从来自上海等的英语老师那里接受英语培训后，搭乘新加坡的远洋货轮出国工作。海外亲属多的江口镇也有数千人在海外亲属帮助下出国打工。1994—1999年的5年间仅莆田县埭头镇石城村依靠海外亲属出国打工者就挣回了1.6亿元。该县萩芦镇水畝村输送了60名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前往美国塞班岛打工。

2. 福清新移民

福建省福清县属于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代表性侨乡而闻名。福清县别称“玉融”。近年来作为往日本的大量偷渡者输出地而闻名。

根据1988年的统计，福建县的人口为101万人，海外华侨华人为40.4万人。福清县内的归侨为1.33万人，加上县内侨眷20万人，为21.33万人，占该县总人口的22.1%，是福建省的重点侨乡。

根据1992年福清市侨联进行的调查，福清市的海外华侨华人约为50万人，其70%以上居住在印尼。

据1997年福清市的侨情普查，福清海外华侨华人共有516543人，其中华侨104965万人，华人411488人。福清市1949—1979年的出国人数只有5290人，改革开放后的1979

—1997年的普查时迅速增加到了44 214人。1999年福清海外华侨华人达到62万人，其中新移民估计为8万人。总之，从福清的情况也可知道，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海外移民正在迅速地增加。

1997年福清市侨办对新移民进行了调查。根据该调查，从福清出国的新移民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福清市新移民状况

国家(地区)	亚洲			(单位:人)
	福清华侨华人 总数	1949—1979年 出国人数	1980年后 出国人数	未取得侨居国 居留权的人数
印尼	364 383	3 726	27 328	4 193
新加坡	73 036	723	5 477	3 153
日本	54 516	587	4 089	15 726
马来西亚	15 504	185	1 162	61
越南	964	0	964	19
美洲				
美国	3 051	37	229	1 666
加拿大	1 601	18	1 583	183
阿根廷	383	0	383	580
洪都拉斯	10	0	10	93
巴西	31	0	31	20
玻利维亚	1	0	1	27
欧洲				
意大利	60	0	60	35
匈牙利	57	0	57	55
法国	43	0	43	10
比利时	35	0	35	5
德国	80	0	80	121
英国	180	0	180	10
瑞典	57	0	57	0
瑞士	69	0	69	0
俄罗斯	2	0	2	357
西班牙	1	0	1	38
南太平洋				
澳大利亚	1 588	16	1 572	1 795
新西兰	306	0	306	45
巴布亚新几内亚	1	0	1	38

资料来源：施雪琴：《改革开放以来福清侨乡的新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27页。

根据表5，侨居印尼、日本、新加坡的福清新移民很多。偷渡日本的福清新移民尤为集中。在前往日本的福清新移民当中，有五分之四没有合法居留权。20世纪80年代以前，欧洲基本上没有福清人。表5中的侨居欧洲的福清人于80年代以后出国。如表所示，福清新移民1980年以后奔赴世界各地。最近在伊拉克被武装势力绑架并释放的中国人都是来自福清的打工者。

根据1997年的福清侨情调查，在1979年以来出国的44214人当中，大学毕业以上学历的人为1340人，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为60余人。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他们的移民形态与老华侨一样，在华人餐馆及工厂打工。

大量的新移民从海外给本国带来大量的汇款，使福清出现了许多海外打工者的豪宅。

但福清新移民并非都是好事。依赖蛇头的偷渡伴随着危险。从中国人偷渡报道可以知道这种情况。让一名中国人偷渡，蛇头集团的收入便会达到2—3万美元。仅1996年一年蛇头集团偷运人蛇暴利就高达70亿美元。进入21世纪的现在，每年偷运人蛇暴利在100亿美元以上。

蛇头的偷渡活动被称为“人蛇贸易”，它控制着秘密的国际劳动力移动渠道。

（三）福建省内的海外新移民活动与国内劳动力移动的联动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而呆在中国农村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开始了全国性的流动。80年代中期农民工开始流入大中小城市，被称为“民工潮”。6.4 天安门事件发生的1989年春，百万民工充斥着铁路、长途公共汽车站。进入90年代后，民工潮的规模并未衰退，反而增大了。90年代中期每年有2500—8000万农民从内陆地区的四川省、贵州省、湖北省、河南省等流动到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全国各大城市。改革开放期间约吸收了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是称为乡镇企业的农村和城镇企业。80年代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出现了苏南模式（江苏省南部的利用上海、南京工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温州模式（浙江省温州的以个体、家庭企业为基础的民营企业）、晋江模式（在福建省晋江这一著名侨乡，利用海外华侨华人的捐款、汇款、技术、商品模式、销售市场发展的民营企业）等。

1. 典型的侨乡乡镇企业模式地区——晋江事例

据该市公安局推算，1998年春季前往晋江市的外来劳动力为236100人。据说1994年已经超过了20万人，但这个数值是经过登记的外来人口。根据魏子熹等的统计，公安机关登记的晋江外来人口1991年只有9万余人，但1994年已达到25万人，加上未经公安机关登记的人，达到了30万人左右（魏子熹等：《晋江的实践与启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据笔者1993年12月在当地采访时从晋江市政府干部听到的消息，当时晋江市的外来劳动力在35万人以上。该数字大概包括了公安机关未登记的人数。从1993年左右到90年代末，晋江市的外来劳动力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外来劳动力是从福建省内流入的。来自外省的打工人员以四川、江西、安徽为多。

1998年,在晋江市的236 100外来劳动力当中,登记人数最多的镇是陈埭镇,为61 000人,其次是磁灶镇的25 000人,接下来是市政府所在地青阳镇的23 000人等。外来劳动力多的镇都是乡镇企业发展很快的地区。陈埭镇皮革、运动鞋产业很是发达,磁灶镇的陶瓷器生产有了发展。在青阳、安海、英林、金井等,塑料、玩具、纺织等很发达。

外来劳动力大多数是未婚青年,文化程度多为中学毕业。许多打工者在拥挤不堪的工厂宿舍起居。90年代中期,在晋江市看到的许多乡镇企业是3、4层楼的集体宿舍,一般一个房间住4—5人,房间仅摆一张床就满了,在工厂的集体食堂吃饭。就业介绍多以打工者春节回乡时带来的形式。在厦门和广州等从出租车司机的口中得知,改革开放初期时的打工者多是知识青年和城市工人在下放的农村认识的农民,他们投靠文革后返城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求他们找到工作。

打工者的收入大多月平均600元左右。除了自己的生活费以外,每年往家乡汇款3 000—4 000元。

表6 晋江市外来民工往家乡的汇款额(1993 - 1997年)

(单位:元)

年度	外来民工汇款额	外来民工占邮局汇款额的比例
1993	488 965 321	85%
1994	666 706 349	85%
1995	111 892 142	85%
1996	1 027 789 358	85%
1997	999 161 668	85%

资料来源:施雪琴:《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侨乡的劳动力流动与人口城镇化》,《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第70页。

表6中的晋江市外来民工汇回家乡的金额自1995年以来每年都超过了10亿元。并非邮寄,而是回乡时自己带回的金额并未列入表中。

根据《福建侨报》(2003年4月8日),泉州地区的晋江、石狮、南安、泉州市内鲤城区等三市二区的民工在2003年春的1个月期间汇回家乡的金额便达到了6.7亿元。许多民工都在春节汇款回家,因此平均月汇款额也许并未达到6.7亿元,但确有大量的汇款。

2. 从外出打工的典型省份看国内汇款

以上论述了福建省典型侨乡的人口(劳动力)的外流(新移民)与内流。作为补充,下面就中国国内打工者输出省的外出打工情况略抒管见。

四川省和安徽省是出省民工较多的典型省份。1999年对这两个地区62个县进行调查、分析了外出劳动力情况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有白南生、宋洪远的《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版)。根据该书,两地区调查的打工地为省内三分之一,省外三分之二。根据该书对2 286人的调查,就外出时间和往家乡汇款(包括带回部分,下同)的情况来看,外出时间平均为9.56个月,月平均汇款为298.37元。其中,男民工月平均318.7元,女民工为254.34元,可见男民工汇款较多。

就教育水平来看，中学毕业生占全体的一半以上，为 1 489 人，月平均汇款 299 元，中专毕业生（40 人）月平均汇款 340 元，汇款额最多，大专以上毕业生（13 人）月平均汇款 324.4 元，汇款额因教育水平而异。因外出打工工种的不同也会出现收入差距。外出务农的民工汇款额最少，月平均为 266 元，从事工业、建筑业的打工者为月平均 300 元左右。服务业分为几个工种。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打工者汇款额最多，月平均为 422 元，社会服务业（拾垃圾、清扫等）的汇款额最少，月平均汇款 258 元。此外，服务业还分为文教卫生、批发零售、饮食业等。

根据 1999 年安徽省、四川省的抽样调查，两地区往外省的打工地为华东地区（51%），中南地区（30%前后），占了 80%。即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北京等省市的打工者比较多。

正如人称“民工潮”，从中国内地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劳动力流动的气势如同“潮水”，不知衰退。起点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 1 亿人以上，这就是不可阻挡的大量人口流动的原因。

这些剩余劳动力流入经济发展的大中城市。这与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 W. 路易斯的“双重经济发展模式”及托达罗模型起到了有效的的作用。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去国内打工，还是出国打工，收入差距起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有可能外出赚钱，出国与国内移动都一样。在国外拥有许多亲属（海外华侨华人）的侨乡人口的国内移动与海外移动更是具有同样的性质。总的来说是从打工地向家乡汇款（包括投资、捐赠）。这不仅在福建，在其他侨乡也大体一样。

二 . 广东省的新移民（出国、出境）

广东省与其他省份不同，改革开放前也有人前往香港、澳门定居。在 1971—1976 年的文革期间，能够获准前往香港、澳门，这与 1971 年 6 月国务院下达的放宽华侨、国内侨眷出入境的指示密切相关。

在 1971—1982 年期间，以正当理由获准往港澳定居的广东人为 30 余万人，加上 1971 年以前的非法出境者 30 万人，便是 60 万人以上。

广东省是输出华侨华人最多的省份。根据《中国人口·广东分册》，1982 年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为 2 123.3 万人（亚洲 1 921 万人、欧洲 24.3 万人、非洲 6.9 万人、大洋洲及太平洋岛 22.2 万人、北美 116.5 万人、拉美 29.4 万人等）。广东省是最大的侨乡省，海外华侨华人达 1 400 万人，占了全国总数的 66%。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开始了。此前的“文革”时代（1966—1976 年）出国受到了严厉的限制。在广东省，1971—1977 年出国得到批准的人（例如侨居海外的亲属去世而出国继承遗产的人）为 2.5 万人。虽是文革时期，但 1971—1977 年年均能有 3 600 人出国，这是因为 1971 年 6 月国务院下达了指示。其内容是，关于华侨、国内侨眷的出入境审查许可，“应该适当地放宽，这有利于团结国外华侨”。改

革开放前的 70 年代开始发生了缓慢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开始的 1979 年开始，海外拥有亲属的广东省内的侨眷侨属中出国者自然地出现了。就改革开放后的广东省整体情况来看，其新移民状况因发表的资料而异。

据全国政协港澳台归侨联络委员会于 1996 年 11 月至 1997 年 5 月进行的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已有 100 万公民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其中广东省的移居人数占了 40 万人。根据其他资料，在 1981—1991 年这 10 年期间，从广东省出国（境）的人累计达 44 万人，占了同期全国出国（境）定居总数的 57%。

下面的关于广东省新移民的调查报告似乎具有可靠性。那是广东省侨办根据国务院侨办关于新移民的意见所进行的新移民“调查报告”。根据有关 1996 年前后情况的该调查报告，广东省的新移民为 37.8 万人（不包括香港、澳门），其中江门市最多，为 18.2 万人，广州市为 11.3 万人（岳乔言：“广东省新移民概况与开展新移民工作的调查报告”，《华侨与华人》1997 年第 1 期，第 63 页）。

表 7 广东省的因私出国、出境人数（1989 - 1997 年）

（单位：人）

年度	获准因私 出国人数	获准因私出境到香港、澳门的人数		获准前往香港、 澳门的旅游人数		广东人获准出 国旅行人数
		香港	澳门	香港	澳门	
1980	42 000 以上 ^①					
1989	64 549	86 882		93 414	114 739	新加坡旅行 85
1990	60 000 以上 (取得护照)	97 900		96 200	135 400	泰国旅行 6 990
1991	60 386	95 622 (探亲、定居)	3 383 (探亲、定居)	120 782	182 218	泰国 4 752 新加坡 608
1992	60 502 (取得护照)	112 258 (探亲、定居)	3 469 (探亲、定居)	154 040	217 974	13 312 (新马泰)
1993	59 570	134 596 (探亲、定居)	3 310 (探亲、定居)	182 249	225 344	24 309
1994	82 481	165 197 (探亲、定居)	4 423 (探亲、定居)	181 666	197 525	73 812
1995	74 554	179 130 香港人子女申请定居香港 46 484		193 422	435 523	146 237
1996	88 094	(探亲、定居) 221 718 在广东子女申请定居香港 58 785		210 848	333 123	168 759
1997	119 219	178 842 在广东子女申请定居香港 15 206		198 249	247 252	118 209

注：①在 1980 年广东省出国人数 42 000 人中，16 000 人往美国、11000 人往加拿大（《中国人口广东

分册》，第171页）。这是广东省内的侨属因改革开放政策放宽部分出国限制（包括侨务政策）而出国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自由出国。

资料来源：《广东年鉴》（1990—199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1. 广东省的因私出境、出国

要考察中国的国外移民，实际上不仅仅是“出国”，也必须探讨“出境”。前往港澳台等“海外同胞居住地”，在中国使用了“出境”这个词。特别是广东省邻接香港、澳门，地理上和传统上人员、金钱、物质的往来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比起去外国，“出境”去香港、澳门更为容易。对广东人来说尤为如此。不少人先去香港或澳门，然后再去外国。“出境者”具有“出国者”预备军的性质。表7是90年代广东省整体包括留学、探亲、海外旅游等在内的出国、出境获准者人数。

广东省的因私出国情况不是根据实际出国的人数，而是根据“得到批准的人数”。这无疑反映了因私出国者的实际趋势。

与前述的福建省因私出国者的图表相同，90年代后半期以后广东省的因私出国者也出现增多的情况。中国整体的因私出国情况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增加，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以后有了急速的增加。这意味着因私出国者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从传统的“侨乡省”以外的各地区出国的出国潮已经来临。往港澳的出境旅游和出国旅行更加速了出国潮。就广东省来看，海外出国旅游者迅速地增加了。从表7来看，进入90年代后，作为华侨居留地，以著名的泰国、新加坡为中心，仅从广东1990年就有50000人左右、1992年13000人、1993年24000人出国旅游。1994年开始急速增加，同年达到73000人，1995年146000人，1996年168000人，同年广东省因私出国获准者将近一倍是出国旅游。不过5—6年期间出国旅游者便从5000人左右增加到了16万人以上。

出国旅游对许多参加者来说不仅是观光旅行，也是寻找商机的旅行。出国旅游者中的不少人可以看作以定居海外为目的的新移民预备军。只有取得居留国发行的签证才能出国，仅靠中国方面发行护照不能实现出国，但如果是出国观光，则比取得出国签证更容易。

此外，广东人的因私出境是出到“同胞”的地区，因此与出国相比较为容易。但尤其是台湾与大陆之间还有限制。虽然厦门、晋江附近的金门岛实行部分小三通，但大陆台湾间的直接全面往来似乎还需要时间。

从中国往海外的外流潮的整体框架包括了台湾，冷战格局崩溃后的世界性结构改变、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等是其基础。

广东人的出境以毗邻的香港、澳门为主。特别是往香港的因私出境较多。改革开放前开始广东人就以探亲等形式出境。1971—1982年这12年期间以正当的理由在香港、澳门定居的出境者达到了30万人。如表7所示，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90年代也很多。广东人往港澳的出境者（以探亲、定居为主）1994年超过了16万人，1996年超过了22万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作为再移民从香港、澳门又移居到国外。移居香港、澳门的中国大陆人经由香港澳门往国外再移民是众所周知的。

2. 江门市的新移民情况

往国外的移居因输出地的情况而不同，是多元性的。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后输出了最多

海外移居者。但是，在广东省内往海外的新移民输出地偏重于部分地区。侨乡和新移民输出地在广东省有两个，江门市和广州市。具有代表性的是江门市。这里拟探讨江门市的情况，探索广东省新移民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江门市是省内输出新移民最多的地区。1996 年左右江门市合法的新移民为 182 409 人，占了广东省整体新移民 37.8 万人的 48.1%。新移民不包括往香港、澳门的出境者。江门市新移民的移民目的地为：美国 87 000 人，占 47.8%；加拿大 52 315 人，占 28.7%；南美 27 927 人，占 15.3%；大洋洲 7 688 人，占 4.2%；欧洲 2 772 人，占 1.5%；等等。以与居住在海外的家属团聚等形式投靠海外亲属的出国移民占总人数的 85%。海外留学（包括自费、公费）结束后不回国、长期居留的人占了 10%，其他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劳工移民、探亲后身分变更者等为 5%。

江门五邑是中国的典型侨乡。江门市的五邑是指新会市、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鹤山市。

1996 年，江门市包括两区、五市的总人口为 3 743 615 人（1999 年为 379.8 万人），非农业人口只不过占总人口的 36.32%。汉族占 99.79%。根据 1995 年的 1% 人口调查，江门市每 1 万人有 132 人大学毕业、1 002 人高中毕业、3 054 人中学毕业，4 040 人小学毕业，并非教育水平高的地区。

表 8 江门市五邑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人数（1998 年）

（单位：人）

	海外华侨华人	在香港五邑人	在澳门五邑人	在台湾五邑人	计
新会市	286 737	361 725	59 229	4 861	712 552
台山市	867 009	365 758	66 098	6 367	1 296 232
开平市	491 403	228 193	26 413	4 548	750 557
鹤山市	181 251	133 677	10 038	2 960	327 926
恩平市	307 832	90 096	21 115	4 682	423 725
蓬江区	17 961	71 498	5 772	619	95 848
江海区	3 697	58 427	9 991	528	72 463
总计	2 155 890	1 300 192	198 656	24 565	3 679 303

资料来源：梅伟强：《从侨情调查看江门五邑侨乡的特色》，《华侨与华人》2001 年第 1 期，91 页。

1998 年江门市侨务部门所进行的侨情调查如表 8 所示。由此可知江门市五邑是国内（地区内）人口总数与海外华侨华人及在港澳台五邑人总数大致相同的、海外移民多的地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侨居海外的五邑祖籍人的三分之二居住在国外。江门五邑人的侨居地不是大量华侨华人侨居的东南亚，而主要集中于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等），这是江门地区的特征。就是说，五邑人的 1 551 426 人侨居在美洲，占据了国外五邑华侨华人的 72%。其中，侨居美国的五邑人为 917 694 人。尤其是侨居于美国的台山人为 502 236 人，占了在美五邑人的 55%。

根据上述的 1998 年江门市侨情调查，改革开放以来江门市整体包括港澳移居者在内

的海外新移民（也称新侨民）为 38 万人以上。其中，台山市 16.8 万人、恩平市 12 万人、开平市 6 万人、新会市 2.2 万人、鹤山市 9 千人。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作为移民目的地是江门人最多的几个国家。

三．上海市的新移民

在林金枝教授的出色的研究著作《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上海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就广东、福建、上海的近代华侨的国内投资（1900—1949 年）来看，年平均投资额为：广东 443.8 万元、福建 231.98 万元、上海 214.69 万元。

广东省是输出华侨最多的省份，福建省是输出华侨第二多的省份。当时，上海作为华侨输出地在整个中国也处于低位，但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目的地在国内则处于高位。现在以海外华侨华人资本为中心的外商投资由于改革开放的进展，从珠江三角洲往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扩大、增加。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90 年代开始外商对上海的投资开始增多。从经济效率考虑，外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沿海地带的中心、与内陆有接触点的上海的投资增多是理所当然的。以海外华侨华人、海外同胞投资为主的外商投资有了增加，但上海人的海外移动又是如何呢？下面来看看现代上海的海外移民情况。

上海的海外移民也与其他地区一样，改革开放前后各不相同。

第一阶段（1949—1978 年）。这一时期取得护照因私出国的上海人总计 1 万人左右。出国的申请理由以探亲、定居为多。就出国目的地来看，印尼为 32.1%，马来西亚为 8.5%，东南亚为 57.3%。中国政府在 1958 年以前对归侨、国内侨眷的出国限制很宽松。但是，1958 年大跃进政策施行后出国受到了严厉的限制。

第二阶段（1979—1998 年）。这里主要叙述这一时期。在 1979—1998 年的 20 年期间取得护照因私出国、出境的上海人达到了 65.3 万人。

改革开放时代还可分为 3 个阶段。（1）1979—1985 年的发展准备阶段；（2）1986—1991 年的发展阶段；（3）1992—1998 年的稳定发展阶段。

（1）发展准备阶段（1979—1985 年）

1982 年，从上海往港澳台及外国的移动人口为 7 122 人。其中大部分是出自上海市区，为 6 750 人。1982 年前往海外工作的占 37.04%，国外留学占 14.8%。1982 年从上海向海外移动的人有 20%是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

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因在国外学习、工作而暂时没有户籍的人为 5 457 人。在上述的 7 122 人当中，除了往港澳台的出境者之外，是接近第三次人口普查 5 457 人的数值。这一时期往海外留学的人数较少。根据骆克任等的论述，（1）的阶段上海人取得护照因私出国出境者为 53 000 人，是改革开放前总和的 5 倍以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移民的目的为探亲占 52%，定居占 22.8%。传统的出国形式仍是主流，但在国外学习语言的占 20.7%，其后国外留学的萌芽已经显现。这一阶段上海的出国目的地以北美为多，美国占 63.9%，加拿大占 6.2%，这些出国者的文化水平很高。中等文化水平占 62.2%，而大学本科毕业的也占了 31.3%。

(2) 新移民增加时代 (1986—1991 年)

这个阶段, 上海人取得护照因私出国的人数为 21.6 万余人, 年平均达到了 3.6 万人。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公布以后, 法律上已承认中国公民有权利出国、出境, 上海的因私出国者有了增加。1986 年, 上海市的出国、出境者在上海现代史上第一次超过了 1 万人, 达到了 10 067 人。1987 年倍增至 20 261 人。1988 年, 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语言学校留学签证比较容易取得, 因此往日本等国的语言学校留学者骤增, 形成了盲目的出国潮。出国者骤增, 达到了 64 066 人。在日本、澳大利亚, 骤增后实施了入境限制, 日本也发生了未付上海人日语学校留学生学费的问题等, 1989 年以后, 出国者趋于减少。1991 年出国者减少到 30 302 人。此外, 根据 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 上海“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暂时无户籍的人”为 66 336 人, 在全国各省市中是最多的。这可以认为是 80 年代末骤增的以语言留学为主的留学生等在 1989 年以后的减少期间也滞留在该地区。

关于这个阶段因私出国的理由, 《上海侨务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记载, 在国外的语言留学占首位, 为 54.4%; 探亲占第二位, 为 31.6%; 另外海外定居占了 5.2%。即: 这个时期的因私出国骤增的因素主要是自费学习语言。出国目的地也是语言留学地日本占第一位, 为 38.1%, 澳大利亚占第三位, 为 17.4%。出国目的地的第二位是美国, 占了 24.7%, 第四位是加拿大, 为 5.4%。

上海新移民很少前往过去华侨的目的地东南亚。发达工业国占了大多数。这个阶段的上海人出国者文化水平很高, 中等文化水平占 43.7%, 高等文化程度(大学、大专毕业)占 49.9%, 各占一半。

(3) 上海移民的稳定增加阶段 (1992—1998 年)

这个阶段上海取得护照、因私出国的人总计 38.4 万人, 年均 5.5 万余人, 显示了稳定的增加。(参照图 2) 这个时期的上海由于改革开放的进展及高经济增长和出入境政策的改善, 出国出境者有了大幅增加。

80 年代末以来的以语言留学为目的的出国减少了, 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出国很多, 此外还有自费留学、海外旅游、就业、定居等, 出现了多样化。就比率来看, 就业占 14.8%、语言留学占 11.5%、自费留学占 5.4%、公费留学占 8.7%、定居占 9.2%、会友占 3.1%、旅游占 2.3%。

出国目的地以美国最多, 占 28.2%; 日本次之, 占 25.1%; 澳大利亚列第三, 占 9.2%。此外, 新加坡、泰国、加拿大、新西兰、马来西亚、法国、韩国也进入了前十位。这个阶段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占了大多数, 出国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在 80 年代初期前往海外的人当中, 出现了取得绿卡或居留权的上海人。他们帮助上海市内的亲属、朋友移居海外。也出现拥有高级技术的人在海外就业的情况, 也有在侨居国兴办合资企业, 从中国国内雇用朋友和友人的情况, 出现了多样化。

改革开放后, 上海市民从多种渠道出国, 在居住国取得永久居住权, 或取得居住国的国籍, 这些人被规定为新移民。关于其动向, 《上海侨务志》做了介绍。根据该书, 在 1979—1995 年期间, 在上海获得出国处境许可的人有 34.4 万人。其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上述规定的新移民。根据上海侨办从 1996 年 5 月开始半年期间进行的新移民调查, 1978—1993 年的上海新移民达到了 41 399 人, 40 岁以下的人为 17 510 人, 占了 42%, 40 岁至 50 多

岁的人为 10 096 人，占了 24%。可见为主的是青壮年。新移民的特征是，出国前具有大学（大专）学历的人占 60% 以上，在国外获得更高的技术知识后，许多人从事专业工作。留学、出国目的地当然是 IT 产业等尖端技术发达的国家为多。在新移民中，前往美国的人占了总人数的 35.4%，港澳地区为 33.6%，日本为 7.4%，澳大利亚为 7.1%，加拿大为 7.2%，其他地区为 10.3%。

侨居于北美、西欧等的上海新移民在公司、科研教育机构工作的人较多，收入比较高，但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在积蓄财力。在上海新移民中，以新移民为主，在侨居国设立了专门社团，并进行可相互保护、依赖的合作活动。例如，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施伟山担任美国计算机协会会长，上海医科大学的洪钧言任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会长，他们在美国成立专家团体，在经济、科技方面与上海、中国国内及其他地区进行了网络化。

这些上海的专家、知识分子在发达国家留学，在发达国家的尖端产业就业，在侨居国建立上海人网络，这种与祖国的尖端产业之间的网络的形成与扩大的结构在传统的华侨身上是没有的。这是上海新移民的新华侨形象。许多老华侨是前往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国劳工。在上海新移民中，许多高学历、高技术的人往美国留学、就业。高收入、更高层次的取得使得他们在财力和技术力量方面的影响比以往的华侨和从事单纯劳动的新移民要大得多。中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尤其是 IT 产业的发展 and 与上海新移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此外，根据 1995 年上海市侨办对海外华侨华人的调查，上海 13 区、7 县、各机关部门（各局、学校、科学研究所）的海外移民（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共有 345 395 人。其中 17 591 人侨居国不明。在上海市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总人数 345 395 人当中，海外华侨华人 177 510 人（51.39%），香港同胞 143 876 人（41.6%），澳门同胞 6 718 人（1.9%），其他不详者 17 591 人（5%）。就分布情况看，北美 90 143 人（26.4%）、亚洲 233 491 人（68.4%）、欧洲 10 982 人（3.2%）、拉美 2 995 人（0.9%）、大洋洲 2 759 人（0.8%）、非洲 1 155 人（0.3%）。

根据 1990 年左右的数值，上海市的海外华侨华人为 2.7 万人，主要侨居地是北美、日本。王京治主编的《侨务知识手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版）也记载，上海市出身的海外华侨华人为 2.66 万人，港澳同胞为 6.1 万人。华侨华人 2.66 万人与山西省、安徽省同样。1990 年前后上海的海外华侨华人规模与其他地区相比很小。由此可见，仅 5 年期间，1995 年上海市海外华侨华人便增加了 6.5 倍以上，为 177 510 人。

1979 年至 1989 年有 152 000 名新移民从上海出国（大多是因私出国）。在这些出国者当中，侨居海外的新移民占据了多数，因此可以认为上述 80 年代末期的上海出身的海外华侨华人 2.66 万人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

四．北京市的新移民（以留学生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0 年，北京市新移民为 10 万人以上。从留学出国成为新移民的人占了大多数。例如北京市宣武区，在该区出国的人当中，留学出国占了 70%，留学结束后，

许多人在居住国成为了白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新移民增多了。北京也成为了“新侨乡”。

根据 90 年代末对北京市海淀区进行的调查，从海淀区出国的 6 932 名新移民及国外留学人员当中，博士学位获得者占了 19.4%，硕士获得者占了 30.21%，大学毕业的学士占了 20.04%。北京与上海一样，新移民也有着高学历者占多的特征。

根据方雄普等主编的《华侨华人概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年版），北京出身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为 25 万人，该市的归侨、侨眷仅为 4.9 万人。此外，根据李原、陈大璋的《海外华人及其居住地改观》（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年版），北京市的海外华侨华人（不包括港澳同胞）为 8 000 人，没有达到 1 万人。在整个中国也是很低的数值。1990 年左右之前，改革开放后北京往海外的移民也很少。

根据《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 年版），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因在国外大使馆工作及支援盟国等，其因公出国者比其他地区多。但是，在文革时期的 1975 年，往港澳及外国的出国、出境者只不过 2 833 人。但改革开放后逐渐有了增加，1979 年为 3 899 人，1980 年为 5 164 人，1981 年为 7 119 人，1982 年为 6 433 人。这段期间的出国、出境者以政府的工作调动和公费留学为主。即：工作调动占 50%，公费留学占 35%。而且 80 年代初期的出国出境者仍反映了重视第三世界这一国家政策。往发展中国家的出国占了 69%，发展中国家的建设事业、支援及相互合作受到了重视。

1997 年改革开放虽已开始，但 1983 年以前的出国留学仍以公派为主。1984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自费留学的暂行规定”，中国公民的自费留学在法律上得到了许可。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的出国留学在 2000 年之前为近 7 万人。仅 1998 年北京自费留学出国者便超过了 5 000 人。中国整体的自费留学 1997 年为 14 720 人，1998 年为 11 443 人，由此可知北京市的自费留学出国者之多。

北京的自费留学学者以高学历者为多。表 9 是 1996—1998 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自费留学情况。两校都是位于北京的代表性大学。北大、清华大有 10—20% 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令人吃惊。

表 9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自费出国留学情况（1996 - 1998 年）

大学	学位	1996 年	占毕业生 比率 (%)	1997 年	占毕业生 比率 (%)	1998 年	占毕业生 比率 (%)
北京大学	四年制本科	275 人	12.00	427 人	15.00	301 人	14.00
清华大学	四年制本科	229 人	9.70	351 人	14.60	379 人	15.40
北京大学	硕士、博士	150 人	16.70	176 人	17.00	261 人	23.70
清华大学	硕士、博士	239 人	24.60	345 人	31.00	388 人	36.30

资料来源：黄润龙：《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82 页。

根据 1990 年的人口普查，居住在海外（留学、工作）、暂时没有户口的人上海市占首位，为 66 336 人，北京市次之，为 48 956 人。两市的 11.3 万人在该普查中占了全国侨居国外者的 47.5%。两市都是国外留学人员占大多数。在 1990 年的人口普查中，北京市仅海淀区就有近 2 万人、即 19 538 人成为出国者，占了该市出国者 48 956 人的 40%。2000

年的人口普查时，海淀区出国留学、工作等暂时没有户口的人为 20 437 人，占了在国外居住、没有户籍者 39 468 人的 51% 以上。海外留学之多与海淀区不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许多计算机企业、研究机构集中于中关村的情况不无关系。

五．浙江省的新移民

（一）改革开放后不久（80 年代初期）浙江省的新移民

根据改革开放后不久的 1980 年底对浙江省内侨眷进行的调查，当时在国外的浙江人为 56 000 余人。其移居目的地多是欧洲（荷兰、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亚洲（新加坡、日本、印尼、马来西亚等）、美洲（美国、加拿大等）。浙江省的主要移民输出地（5001 人以上）是永嘉、黄岩、青田、温州、杭州。浙江人移居欧洲的人口大多数是从浙南出国。其中，温州、青田、瑞安、永嘉、文成 5 市县占了移居欧洲的浙江人的 83%。这是 1980 年底调查的情况。提起海外华侨，人们只会想到侨居东南亚的中国人，可见居住在欧洲的

表 10a 浙江省获准往港澳定居、临时居留的人数（1978 - 1984 年）

年度	出境到香港的人	出境到澳门的人
1978	1 078 人	
1979	1 549 人	
1980	1 408 人	35 人
1981	1 432 人	73 人
1982	1 353 人	35 人
1983	1 508 人	40 人
1984	2 309 人	56 人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第 169 页。

表 10b 浙江省取得护照往国外移居的人数

年度	出国到外国的人
1978	956 人
1979	2 044 人
1980	2 551 人
1981	1 871 人
1982	1 839 人
1983	3 019 人
1984	3 609 人

资料来源：同表 10a，第 171 页。

华侨很少。浙江省海外移民的特征之一是欧洲移居者很多。如后文所述，由于改革开放的进展，浙江人的欧洲移居增加了。

浙江省也有移居香港、澳门的人。根据 1980 年底对浙江省内的港澳居住者亲属进行的调查，1980 年底有 52 000 余名浙江人居住在香港、澳门。浙江省的赴港澳人员与赴欧洲人员不同，以宁波、鄞县、镇海、舟山一带为多。他们在香港工商界、海运界、金融界有着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新移民（出国、处境）的情况如表 10 所示。一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公布的 1986 年开始，出国申请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得到了承认，因此因私出国、出境增加了。在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文革时代，“海外关系”曾被等同于“反革命关系”，受到了批判，改革开放后不久的海外移居出国、出境者便仅限于侨乡等。

（二）浙江省新移民的整体情况

根据中国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于 1996 年 11 月至 1997 年 5 月实施的新移民专题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移居者达到了 1 000 万人。从各输出地省份来看，浙江省仅次于广东省的 40 万人，达到了 25 万人，福建省、上海市各为 10 余万人。根据该调查，浙江省是全国新移民第二多的省份。

根据浙江省侨办的资料，1998 年以前的浙江省新移民为 364 513 人。此外，根据浙江省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资料，1998 年以前的浙江省新移民人数与侨办资料大体相同，为 366752 人。

在上述 3 种资料中，吴潮等认为第三种浙江省出入境管理局的数值最可靠。理由是没有依赖其他部门，而是依靠出入境管理局自己的部署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吴潮等的主张，估计 2000 年的浙江省新移民从 1989 年底的 40 万人又增加了 10 万人，达到了 50 万人。其依据之一是 1998 年 1 年期间浙江省因私出国人数便有 61 213 人。出国潮进入 21 世纪后仍没有衰退（吴潮等：“浙江籍海外新移民研究初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22 页）。从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来看，浙江省的“临时赴国外工作、留学等的滞留人数为 54 786 人，1998 年的因私出国者为 61 213 人，似乎比 2000 年更多一些。

虽说是浙江省的新移民，实际上偏重于浙江省的一部分地区。即温州地区和丽水市管辖的青田县等浙江省南部（浙南地区）地区。浙南地区的新移民占了浙江省整体新移民的约 90%。拥有作为传统侨乡而闻名的宁波和舟山的浙江省东部与国外新移民的关系很淡薄。但如上所述，往香港、澳门的出境以宁波、舟山为多。

浙江省新移民的移居目的地并非移往华侨所去的东南亚。其 70% 是西欧。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是主要的移居国。浙江省新移民的 20% 移居美国。西欧和美国占了浙江省新移民的 90%。

从浙江新移民的移居前职业来看，农民出身最多，占了约 50%。其次是工人出身，占了 25%，商人约占 12%，学生占 7—8%，干部约占 5%。输出许多新移民的温州地区和青田县的农民比重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杭州地区、宁波地区、绍兴地区的农民比重比前两个地区低。

浙江省新移民出国前的文化水平不太高。文盲、半文盲占 7—8%，小学程度约占 30%，中学文化为 40% 以上，高中文化占 10%，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占 7—8%。大学以上的新移民是温州、青田以外地区的出身者。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台州等是留学生占新移民比重较大的地区。但根据浙江省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1979—1995 年 16 年期间浙江省自费留学人员为 13 790 人。

（三）浙江省的代表性新移民输出地情况

1. 丽水市青田县的新移民

就新中国成立后青田县的海外移民数来看，1950—1976 年为 367 人，1979 年改革开放开始后，1986 年之前有 10 948 人出国，改革开放后这一期间每年平均有 1 368 人出国。

青田县原是贫困山区的县。根据吴潮等的叙述，为了减轻人口压力，相当于县人口三分之一的 18 万人移居海外或到海外打工。近 3 年期间，青田县的新移民年平均 2 万人前后，2000 年为 3 万人以上。

据说青田县的新移民与偷渡密切相关。根据莫邦富基于中国记者常氏的原稿所写的《蛇头》，浙江省青田县是毗邻温州市的一个小县，流着称为瓯江的一条河。距离通列车的金华市有 100 公里以上。出了许多老华侨、新华侨、伪装难民等，青田县内的各乡村都出了海外移居者，是华侨的“名产地”。“青田人往欧洲的偷渡渠道为：青田→厦门→昆明→景洪→色乐（缅甸）→清莱（泰国）→彭世洛（泰国）→曼谷→经由莫斯科往维也纳。但如莫邦富所述，偷渡存在着贩卖人口等许多涉及人身和金钱的危险。

表 11 温州市公安局批准个人出国的人数（1983 - 1998 年）

（单位：人）

年	出国	出境到香港、澳门、台湾
1982—1983 年	4 508	
1984 年	4 751	
1985 年	5 035	236
1986 年	4 207	566
1987 年	7 435	623
1988 年	4 306	666
1989 年	7 526	685
1990 年	8 607	639
1991 年	7 957	
1992 年	8 759	
1993 年	7 292	
1994 年	5 173	
1997 年	16 541	1 092
1998 年		26 017

资料来源：《温州市志（上）（下）》，中华书局出版，1998 年，第 405、2404 页；

《温州年鉴（1998）》，中华书局出版 1998 年，第 314 页；《温州华侨史》，今日中国出版，1999 年，第 104 页。

2. 温州地区的新移民

下面从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情况来看浙江省的典型新移民输出地温州地区。

表 11 没有包括在其他地区申请出国、或非法出国、或劳务出口没有回国的人等。因此，实际的出国者要比表中的数值大得多。温州正规的因私出国者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增加，尤其是 90 年代后半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从表 11、表 12a、表 12b 也可知道。

表 12a 温州人的海外华侨华人分布（1994 年）

地区	主要侨居国	人数（人）
欧洲 155 000 人	法国	60 000
	荷兰	35 000
	意大利	30 000 以上
	西班牙	20 000
	德国、比利时	
	澳大利亚	
	英国、瑞士	
	丹麦	20 000 以上
	瑞典	
	罗马尼亚	
亚洲 25 000 人	新加坡	10 000 以上
	日本	4 300
	菲律宾、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10 000 以上
	越南、印度 缅甸等	
美洲 50 000 人	美国	40 000
	加拿大、秘鲁	
	哥伦比亚	10 000
	阿根廷 巴西等	
非洲		1 000 弱

注：1994 年的海外温州人为 248 000 万人。

资料来源：《温州市志上》，中华书局出版，1998 年，第 406 页。

表 12b 温州人的海外华侨华人分布 (1997 年)

地区	温州人数
欧洲	200 000 余人
亚洲	30 000 人
美洲	70 000 余人

注：1997 年底温州人的海外华侨华人为 30 多万人。

资料来源：《温州华侨史》，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 年，第 113 页。

3. 温州市输出新移民的代表性地区

温州市的新移民虽然自改革开放后有所增加，但那只是温州市的部分地区。1998 年，温州市总人口为 718 万人，由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 3 区和瑞安市、乐清市 2 市及洞头县、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 6 县组成。其中，新移民多的地区是瑞安市和文成县。1998 年瑞安市的人口为 117.76 万人，相当于温州市总人口的 16.4%。同年文成县的人口为 36.99 万人，相当于温州市总人口的 5.15%。虽说两地区的新移民较多，但实际上也只是两市、县的几个地区较为突出。

(1) 瑞安市

根据 1995 年底的调查，瑞安市出身的海外华侨华人为 23 492 人，其中丽畹镇最多，为 6 248 人，接下来是仙岩 4 535 人、城关 2 916 人、桂峰 1 689 人、枫岭 1 385 人，瑞安市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有海外亲属。

表 13 瑞安市丽畹镇海外移居者的分布情况 (改革期)

(单位：人)

年份	合计	法国	荷兰	意大利	西班牙	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1986 年	968	806	138		1	17	6	
1994 年	4 790	3 473	316	643	8	35	21	5
1995 年	6 235	4 944	316	884	8	38	21	5
1996 年	7 965	6 270	495	1 136	13	50	39	15
1997 年	9 385	6 912	506	1 768	14	56	40	

注：80 年代是丽畹镇出国人数最多的年份，1980 年为 144 人、1984 年为 139 人、1985 年为 150 人（《温州华侨史》，第 104 页）。因此，可以认为在 1986 年海外居留者 968 人中有 400 人左右是改革开放后的 1985 年以前出国的人。

资料来源：《温州华侨史》，第 179、182 页。

从 1995 年前后分布于全世界的瑞安人为 23 492 人的情况来看，第一位是法国，9 881 人，第二位是意大利，6 202 人，第三位是荷兰，3 426 人，第四位是美国，1 475 人，第五位是新加坡和西班牙，均为 563 人，第七位是德国，250 人，第八位是澳大利亚，205 人，等等。

1950—1978 年期间，瑞安市丽畹镇的出国者为 209 人。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 80 年代，

出国人数大为增加。即：该镇的出国者 1980 年为 144 人，1984 年为 139 人，1985 年为 2 150 人。瑞安市丽畹镇 50 年代—1978 年的出国者仅为 209 人，但 1995 年增加到了 6 248 人。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

丽畹镇是温州市的重点侨乡。该镇改革开放后的海外移居者的分布如表 13 所示。移居欧洲者占多数，尤其是移居法国者占了 72—83%。

根据 1997 年的统计，丽畹镇的海外移居者达到了 9 385 人，比 1986 年的 968 人增加了 9.7 倍。而且仅 80 年代前半期的 3 年期间就有 433 人出国，因此从 1986 年的海外移居者中扣除了这个人数，改革开放以前该镇的海外华侨华人便是 535 人左右。由此可知改革开放后海外移居者增加得多么快。

（2）温州市文成县（以玉壶区为主）

1997 年的文成县由 8 个镇、27 个乡组成。总人口 371 717 人，占温州市总人口的 5.25%。文成县的北邻有著名的新移民出身地——青田县。文成县是山村。新中国成立后的 1949 年至 1985 年，文成县的出国者为 3 716 人。在这 3 716 人当中，2 990 人是 1980—1985 年期间的出国者。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许多出国者。文成县有 12 个侨乡。玉壶镇、周壤乡是温州市的重点侨乡。玉壶镇有 27 个行政村。1992 年 5 月乡村合并时将东背乡、李林乡合并成为玉壶镇，当时该镇的人口是 21 770 人。1996 年底减少到 18 000 人。1992 年至 1996 年底期间，除了往国内外地的打工、学习之外，大多数是因出国定居而减少的。4 年半左右便急速减少了 3 770 人（相当于 17%）。而且减少的人数大多是由于出国所致。1992 年文成县玉壶镇的人口为 21 770 人，其中 5 463 人是海外华侨华人。玉壶镇是海外华侨华人占总人口 25.1% 的重点侨乡。

新中国成立前的 1948 年，玉壶镇整体的海外华侨为 1 141 人。其分布为，日本 372 人、新加坡 363 人、法国 169 人、意大利 105 人、马来西亚 74 人、荷兰 40 人、德国 9 人等。文成县内出国者最多的是玉壶镇，为 320 人。其侨居地以新加坡和日本为多，分别为 131 人和 125 人。当时海外华侨仅次于玉壶镇的地区是朱雅乡，有 203 名海外华侨，其中日本最多，有 104 人。

就改革开放后的 1990 年来看，玉壶镇整体的海外华侨为 9 119 人，其中意大利最多，为 4 896 人，接下来是荷兰 2 084 人、法国 1 774 人、德国 270 人、西班牙 223 人、新加坡 180 人、奥地利 94 人、马来西亚 65 人、比利时 39 人、美国 28 人、罗马尼亚 22 人、日本 18 人。侨居欧洲者占压倒多数。日本居留者大幅度减少了。关于居住在日本的温州人减少的原因，如《温州华侨史》的“一战后温州人移居日本的热潮与华工在日本的遭遇”和《温州市志（上）》的“1923 年温处两地旅日华工被日本暴徒杀害名单”等中所述，关东大地震时中国人（温州人）在日本受到虐待、歧视的问题是其根源。

此外，就 1993 年文成县玉壶镇海外移居者在居住国的职业来看，餐馆和食堂、成衣、皮革业是三大行业。60.78% 的人在餐馆和食堂工作，20.7% 的人在成衣铺工作，剩余的 15.83% 在皮革厂工作。大多数是不需要高文化水平的职业。

（3）文成县的贫困与海外移民

从表 14 可知，文成县是温州市的近乎最贫困的县。文成县的农民人均收入 1997 年为 1 608 元，1998 年为 1 752 元，还达不到温州市整体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

就 1997 年、1998 年温州各县（市、区）乡镇工业总产值来看，文成县 1997 年为 3.2019 亿元，1998 年为 3.2194 亿元，接近于最贫困。最贫困的泰顺县 1997 年为 3.0006 亿元，1998 年为 3.4486 亿元，超过了文成县。第一位是瑞安县，1997 年为 199 亿元，1998 年为 220 亿元。

文成县在温州市是最贫困的山村，可以认为是因为贫困才往海外移居的。

表 14 温州市各区、市、县的年平均收入情况

（单位：元）

		1997 年	1998 年
温州市整体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8 013	8 942
	农民人均收入	3 658	3 833
鹿城区	城镇居民科处分平均收入	7 848	8 968
	农民人均收入	6 510	6 708
龙湾区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农民人均收入	5 538	6 181
瓯海区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农民人均收入		5 605
文成县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4 100	
	农民人均收入	1 608	1 752
苍南县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7 112	
	农民人均收入	2 982	3 209
瑞安市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7 417	8 820
	农民人均收入	4 135	4 472
乐清市	城镇居民平均生活费收入	8 115.6	8 579
	农民人均收入	5 028	5 219
永嘉县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农民人均收入	2 748	2 938
洞头县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5 115	5 612
	农民人均收入	2 625	2 935
平阳县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5 300	5 424
	农民人均收入	3 281	3 321
泰顺县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		
	农民人均收入	1 304	1 516

资料来源：温州市整体平均收入系根据《温州年鉴（1999）》（第 511 页），其他各区、县、市平均收入系根据《温州年鉴（1998）》、《温州年鉴（1999）》。

4. 作为新移民输出地背景的“温州模式”

本文论及了包括温州市在内的浙江省各地的新移民。如上所述，温州是浙江省新移民输出地的典型地区。这里就作为新移民输出地的社会经济及地区背景的“温州模式”进行简单的论述。

(1) 温州模式

温州市改革开放后作为“温州模式”而闻名。根据张仁寿、李红的《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温州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模式之一，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发展了钮扣等批发市场 267 个、大小商品市场 472 个（1986 年），1987 年在全国拥有具备 14 万余名销售员的供给销售流通网，具有“小商品、大市场”的特征。温州发展农村家庭工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资金市场（民间借贷）、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市场经济”为中心也取得了发展。

1978 年改革开放前温州 188 万劳动力的 89% 从事农业，存在着 100 万人以上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内的非农业部门取得了发展，但仍需要到温州以外的地区打工赚钱。

(2) 温州营业方式

家庭经营、批发市场、供给销售大军被称为温州的三大要素。这是改革开放后在全国（大市场）以薄利多销的方式销售温州生产的各种鞋类、打火机、照明器具、提灯、羊毛衫、各种服装、钮扣、拉链等消费品、小商品的方法。

90 年代 100 万名温州人散居在全国各地做买卖。在这 100 万人当中，有 15 万人为了销售“小商品”在全国活动，40 万人在外地摆摊做生意，30 万人从事理发、修理、饮食业等劳务活动。

根据 1997 年的统计，在国内各地做生意的温州人达到了 160 万人（包括小孩），占了温州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有温州街、温州商城。尤其是北京的“浙江村”很有名。1994 年北京浙江村的 59.12 万人中有三分之一是温州人。

随着温州的家庭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及温州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温州的人员移动扩大到了国内所有地区。可以认为，这种温州的经济社会环境也对海外移动（新移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原载山岸猛著《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日本论创社，2005 年）

刘晓民 译